

杨 慧/著

朔风中的行迹

文学与影像中的现代性话语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12221005)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朔风中的行迹

——文学与影像中的现代性话语

杨 慧/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 晋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朔风中的行迹：文学与影像中的现代性话语 / 杨慧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57-0996-4

I. ①朔…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5155 号

朔风中的行迹：文学与影像中的现代性话语

著 者：杨 慧

责任编辑：薛勇强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996-4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朔风中的行者及其行走的思想

——序杨慧《朔风中的行迹》

王春荣

杨慧的新作《朔风中的行迹——文学与影像中的现代性话语》即将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在此深致祝贺之意。当然,祝贺的同时也有些许忐忑:作者诚恳邀我为其新作作序。我知道,就杨慧的为人为学应该会有更合适的人选为其作序。但我无法推脱的理由则是因为他曾经在我的门下读硕士,而这部书稿的主体部分都是杨慧读硕期间的思想成果。杨慧是我的学生,我们的关系亲到如朋友,如母子。如此,便于忐忑中命笔,为之作序。好在我认为,“序”这种批评文体没有固定模式,意之所致,笔之所至,只要置于原作之前,均可叫做“序”。

杨慧尊我为师,我视杨慧为我的名片。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我的弟子,我的名片》,骄傲地把我的学生视为我的名片。在我从教几十年中,先后带过40多个硕士生,10个博士生。他们当中有名校教授、副教授,出版界的精英,高校的管理者等等,即使做个普通公务员,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有声有色,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精英。其中,杨慧不愧为这个群体中一颗闪亮的星。本来,他本科毕业后即刻就有一份令他的同学艳美的工作——留在省城,工资待遇也不错。但是,一年后,他还是毅然放弃了这份工作,满怀对着校园文化生活的憧憬,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学位。在学三年,杨慧如鱼得水,如牛得草,整天钻图书馆、查资料,本专业课外还到处“蹭课”,真正是如饥似渴,朔风疾行一学子。其新作《朔风中的行迹》中第一章“疯人的谱系”的

前身,即是杨慧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在细读新时期小说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文学现象——“癫狂叙事”与“疯子形象”,并运用一种新视角、新方法,将其谱系化,体现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发现”的慧眼。“真假”疯人的“癫狂”表演;“洪水叙事”中的疯癫与理性;“疯女人”的癫狂叙事;“寻根”与“先锋”:现代性的两种疯癫想象;“疯癫”视域下的《棋王》与《象棋的故事》;“疯癫”的新世纪际遇等等构成他硕士论文的新鲜而合理的框架体系,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硕士论文。

当然,对于杨慧而言,这样的优秀硕士论文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毕业当年,杨慧怀着继续深造的理想,同时考取了两所重点高校重点学科的博士,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师从王中忱、解志熙等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令我更为惊喜和骄傲的是,杨慧以三年的时间就通过了博士毕业论文,拿到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这在清华大学这所名校来说是少见的快捷而有效的学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业已由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解志熙先生为其作了一篇深刻而亲切的序。解先生给予该书以高度而中肯的评价,认为本书新见迭出,在某些方面甚至填补了瞿秋白研究的空白。新作《朔风中的行迹》已经是杨慧的第二部大作了,自然是可喜可贺。

但是,杨慧并没有就此停下他在朔风中疾行的脚步。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之后,他又上了一个台阶,在厦门大学杨春时、俞兆平两位先生名下做博士后。他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研究(1928-1937)》,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标志着他的学术研究的再一次飞跃。我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些,不是在炫耀他的业绩,而是在赞赏一个青年学子对学术梦想的坚守,对中国式知识分子风采的认真而严谨的塑造。10多年来,如他自述他是一直“守候着学术的梦想,抵御着周遭世界的诱惑与内心深处的动摇”,在学术的道路上朔风前行,励精图治。在我看来,经过十几年的艰苦为学,杨慧的学问不但“上道儿”,而且业已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已有好评,自不待说,即使从《朔风中的行迹》中,

我们也可见其原创性、学术性、前沿性的鲜明特征。

杨慧做学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扎实,较真,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爬梳和整理。他的文章可以说都是论从史出,论从细出,论从实出,从不打妄语,就像那个走在土道上的乡村少年,行进在朔风中,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这在众声喧哗、诱惑多多的当下,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他那种泡图书馆,钻故纸堆,坐冷板凳的精神,竟是我这位老师所欣赏,所不及的。每年寒暑假期间,杨慧回归故里,除访亲会友,大块时间是每天蹲在省图的现代资料室里,在尘封已久的图书、报刊中,如饥似渴地“淘宝”,让思想在历史与现实的隧道中穿越。我们从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中都可以见证杨慧扎实的学术根基,用一句流行话说,那才叫“有种有料”。比如《灾荒中的“向左转”:再论丁玲的〈水〉》,以及《“祖国母亲”考辨》等等,发见细微,材料充分,论证扎实可信。

杨慧做学问还有一个特点是,视角独特,思想新锐。杨慧的学术研究在准备阶段,那形象和做派就像个“老学究”,抠抠搜搜,一丝不苟。可是,他的理论评论文章却仿佛换了个人,呈现出一种新锐学者的姿态。《朔风中的行迹》一书,通篇漾着现代性思想和话语修辞。他对于西方现代思想理论资源和本土化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理解,以及在写作中融会贯通的成果体现。书中不仅随处可见鲍德里亚、詹明信、西美尔、布迪厄等人的言论,更重要的是那种属于他自己的现代性思维与思想的建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仅给了他搜集资料时的扎实性、系统性特点,还在建构文章思路 and 思想体系时,形成了一种“谱系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思想。所以,同样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面对被前人反复耕耘过的土地,他总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建树。本书第一章“疯人谱系”便可以看做是向福柯致敬的最好礼物。

杨慧做学问有着非常强烈的探求精神和问题意识。这在今天的硕士生培养中应该是一个关键,而在杨慧已经养成了一种素养、素质。所谓问题意识,绝不是主题先行,预设一种思想,而后去“按图索骥”,去寻找支持自己“学术观点”的例证。问题意识来源于对原始资料的充分、充足的占有,以及

对这些原初资源的咀嚼消化,把追问建立在学术资源之上,寻找其中蕴含的原生问题。问题意识,也必须建立在对相关领域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鉴定之上,寻找学术创新的缝隙和空间。当然,问题意识还必须建立在厚实而前沿的理论储备之上,特别是对于搞文学批评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没有理论,就没有眼光,没有眼光,就没有照亮素材的光芒。这在杨慧,就是所谓“行走的思想”,既尊重学统,又做好自己。这种“行走的思想”便是永不止息的问题意识,具有穿透力的学术思想的创构。

“序”到这里,似乎应该打住了,但我还想说说杨慧这个“人”。杨慧是好人,是个在亲朋好友中、同行同事中都被看好的好人。这种评价看似平常,实际做到却很难。当今的人,因为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真正呈现出千人千面、光怪陆离的面孔。尤其那些“功成名就”之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滋生出飘飘然、唯我独尊的骄娇之气,总觉得自己是个“成功人士”了。要么,就是所谓“功不成名不就”的人,甘于平庸,或者自暴自弃,抱怨自己没活出个“人样”来。杨慧,长得“高大帅”,却怀揣一颗平常心,淳朴之心,感恩之心;杨慧学历高、学问好,却不骄不躁,谦虚谨慎,锐意进取。当然,杨慧的好人形象还在于他有一个优秀的妻子、一个在宗教美学领域已初见成就的女学者芮欣的淬炼和打造。所以,我真心地相信已经冠有多种头衔的杨慧,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能一如既往,道路越走越宽广,形象越来越完美,所谓“德艺双馨”。

以上为不是序的“序”。

写于2014年沈阳之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疯人的谱系	1
第一节 “真假”疯人的“癫狂”表演	4
第二节 “洪水叙事”中的疯癫与理性	11
第三节 “疯女人”的癫狂叙事	19
第四节 “寻根”与“先锋”:现代性的两种疯癫想象	31
第五节 “疯癫”视域下的《棋王》与《象棋的故事》	39
第六节 “疯癫”的新世纪际遇	44
第二章 左翼的踌躇	50
第一节 作为“文艺大众化”实践场域的《北斗》	50
第二节 灾荒中的“向左转”:再论丁玲的《水》	66
第三章 意象的隘路	89
第一节 “祖国母亲”考辨	89
第二节 “现代派”的“镜子”	115
第三节 “说话”的女人: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徳小说的比较研究	122
第四节 “井”之嬗变	130

第四章 影像的祛魅	141
第一节 “第六代”导演的社会地理学“镜像”	141
第二节 好莱坞镜像:假问题与真思考	148
第三节 以梦解梦:《马大帅》的医方	153
第五章 东亚的借镜	161
第一节 韩国电影中的“兄弟”隐喻	161
第二节 “韩半岛分断”电影的家国叙事	172
第三节 韩国体育电影的“家庭城堡”	186
第六章 时尚的迷途	201
第一节 疲倦的“秋雨”解读	201
第二节 没有“创艺”,何来“创意”	207
第三节 新思想资源的开启: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读后	210
后 记	214

第一章 “疯人”的谱系^①

人们常说：“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从俗常的意义上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欣赏总免不了具有一些疯癫的气质。“事实上，每一个稍微有些敏感的写作者，都容易患上现实与艺术互相悖谬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很有可能误打误撞地闯入精神病家园。……美国有一家麦考林诗人精神病院，普拉斯、洛维尔和塞克斯顿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都曾以此为家。”^②与具有强烈疯癫气质的西方文学传统相比，中国文学传统中疯癫形象的出场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那反讽式的疯癫曾给中国传统文学留下了些许的疯癫印记。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长明灯》，可视为西方文化疯癫经验传染入侵中国本土文化的开始。具有异质性的疯癫话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躯体里突然内爆，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此后疯癫话语逐渐式微，并归于沉默，被幽闭在理性阳光的背后。

然而，疯癫被隐蔽被幽闭并不意味着疯癫从此不存在了。疯癫被隐蔽被幽闭的时代恰恰正是最疯癫的时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的疯癫压抑了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然而，狂躁冲动的疯癫一如地下岩浆突涌的火山，随时可能爆破。进入新时期以来，所有被压抑的东西几乎都找到了喷发释放的出

①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题为《理性与疯癫——新时期文学“疯人”谱系的知识学考古》，作者杨慧、宋一苇。

② 王晓渔：《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南方周末》，2004年3月25日。

口,疯癫自然也就首当其冲。王秋赦、秦书田、隋不召、五龙、颂莲、景焕……新时期小说①中形成了阵容庞大的“疯人”谱系。遗憾的是,囿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边缘”、“阴暗”、“无意义”的“疯人”与疯癫一直被屏蔽在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文本之外,这一谱系所蕴藏的理论价值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对疯癫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勘察。福柯认为不能仅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确诊疯癫的医学身份,因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②。疯癫的诊断史就是理性和权力的殖民史,现代意义上的疯癫是理性偏执化的“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语)之一。现代性与疯癫之间构成了微妙的共生关系,它不仅强行地生产、命名、排斥、规训、清洗疯癫,甚至其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正如帕斯卡尔所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③

福柯所揭示的疯癫与理性(现代性)的共生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性的绝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思是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它关注的必然是“中国现代性”的中国体验,它所面对的是中国特有的现代性难题,它所描绘的也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想象。

对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的强调其实源于中国现代性的被动性。当下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论述足以装备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有待进行福柯式权力话语分析的复杂范畴。④ 笔者则倾向在哲学语境里

① 当前学界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分期有不同意见,本文中的“新时期小说”仅是为求表述方便而采用的时间性划分,大致指1978年以来的中国大陆小说生产。

②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封底题记。

③ 转引自[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前言”第1页。

④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详尽论述可参见旺晖:《现代性问题问答》,《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页。

采用福柯的说法,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① 现代性的“态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以追求理性和主体性为核心,而理性又是核心之核心。依靠理性精神近代西方形成了“发现世界和发现人”(布克哈特语)的新视域,通过“科学的祛魅”击溃神学统治,把自由、民主、博爱等天堂般的字眼播撒到人们心中。也许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但历史并没有给予古老中国慢条斯理地生发、完成自身现代性转型的时间。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逼迫下仓皇上路,走上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旅程。落后挨打的悲惨境遇逼迫中国开始了向西方由器物、制度再到文化的不间断的顽强学习。悖论的是,富国强兵的现代性学习目的恰恰在于反对这种现代性力量对中国的压制,我们要用刚刚学会的西方现代性话语来抵抗它们的发明者,而这些话语本身远不具有其标榜的普世和正义,它的形成史就是近代西方特有的压制、奴役、掠夺的血腥史。这种诡异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②与实践让亿万国人经历着理想的塑型与幻灭,体验着献身的激情与个体幸福的无情毁灭,在通衢与迷途的交织中,绝望地寻找自我的认同。后“文革”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转向,它所开拓的划时代的新现代性实践接续了被“文革”政治理性短暂单极化挤压的现代性想象,给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国的现代性列车驶入快车道,却也迎来了车窗外炫目的风景和多样的风险,不得不面对更加深入和复杂的现代性难题。

中国的特殊语境造就了中国式的现代性,中国式的现代性造就了中国式的疯人。因此中国式的疯癫也就不仅仅是福柯意义上的对现代性暴力的指认和颠覆,它远比西方式的疯癫更为复杂和矛盾。这种疯癫铭刻了中国狂热的现代性追求和深刻的现代性焦虑,成为中国爱恨交织、痛楚迷惘的现代性记忆。“什么是现代性? 什么又是中国的现代性?”这是中国知识精英不断证伪,又不容回避的宏大命题,而文学家又是大部分时段中最活跃的现

^① 参见[法]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534页。

^②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第50页。

代性蓝图编织者。面对文学家笔下的阵容庞大的“疯人”谱系,我们有必要进行阿尔都塞式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所谓症候读法(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就是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①。由此我们得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深入并超越文本,发现、反思、并置文学家的现代性想象,回眸中国坎坷的现代性旅程。

第一节 “真假”疯人的“癫狂”表演^②

作为对“文革”所代表的极左思想的控诉和反思,“反思文学”不但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人民大众对“文革”暴行的控诉欲望,而且在不伤及制度本体的前提下,完成了对旧思想的彻底摧毁,为中国新的现代性旅程开辟了道路。“在‘文革’以后最初几年的话语言说空间中,‘伤痕’、‘反思’小说无疑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也最具社会反响的话语言说活动,正是在‘伤痕’、‘反思’小说的话语言说,以及在关于这些言说的谈论之中,集中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广大民众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想象,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对于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实践的深入反思。”^③

《芙蓉镇》作为“反思文学”的翘楚(荣膺代表主流文化的第一届茅盾文

① [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转引自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86-87页。另:“症候式阅读”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提出的一种具有关键词意义的解读方法,旨在突破意识形态对人思想认识的禁闭,发现被隐藏的真实。具体的介绍与评述可参见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第63-104页。

② 原载《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题为《“真假疯人”的癫狂表演——解读〈芙蓉镇〉的政治叙事学》。

③ 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145页;

学奖,并在改编为电影后大获成功,获得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青睐),为我们解读这种“现代性想象”提供了绝佳的视角。《芙蓉镇》中,秦书田、黎满庚、谷燕山、胡玉音相对于王秋赦、李国香形成了正反两个阵营,而“秦疯子”(秦书田)和“王疯子”(王秋赦)因为具有“疯癫”的极端特性而成了各自阵营的精神代表。古华正是通过二者此消彼长、“零和博弈”的命运轨迹完成了自己的“文革叙事”。

一 王秋赦:假装革命的真疯子

作品中第四位隆重出场的“吊脚楼主”王秋赦是极左思想的标志(“吊脚楼塌了”是“文革”终结的象征),这位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借“极左”之风平步青云,当然,风平浪静后也摔得最惨,从“王镇长”变成了“王疯子”。我们可以用“真”和“假”两个关键词来定义王秋赦:一个“假”装革命的“真”疯子。

说王秋赦是“真疯子”,是因为他的疯癫在这里并没有生成悲剧性的美,而只是变态的丑。王秋赦发疯的病根是使其险些得了“色癫”的“下作的行径”(意淫),直接原因则是他在“文革”后被一撸到底,权力欲遭受重创。值得注意的是,疯癫是“王秋赦阵营”共有的负面价值的代表(李国香是丑陋、变态,杨民高是虚伪、冷酷)。另外,疯癫是作者对“王秋赦阵营”所代表的极左思想的最后否定:“……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喊叫着:‘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总而言之,疯癫是极“左”路线送给王秋赦的最后“大礼”,是其自作自受的报应。

王疯子之“假”在于其革命动机的虚假性。“娘卖乖!要是老子掌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王秋赦抱着这样的投机主义混入革命队伍,他对革命话语的堂皇言说只是因为它们可以给他带来性(逃亡地主遗弃的姨太太)、住所(“吊脚楼主”)、地位(“土改根子”、“王支书”、“王镇长”)和荣誉(“参加地、县农业参观团”)。而和“疯”一样,“假”也是“王秋赦阵营”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是混入革命阵营的假革

命。李国香是个性变态者，“天啊，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雨露滋润的女人，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季节一过凋谢萎缩？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积习成癖，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叙述人暗示，这种嫉妒后来便成为她迫害胡玉音的心理动机，而她对谷燕山的“革命”则是对后者拒绝勾引的报复。另外，作品中出现的最高领导——“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杨民高也是个假公济私的官僚主义者。至此，作者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全部绑到了“假恶丑”的耻辱柱上。

小说中，叙述人采取了指点江山式的全知视角，牢牢掌握着话语权。但是如果我们对本文加以“症候式阅读”，还是会发现内在的叙述裂隙。王秋赦是个历尽苦难的孤儿，他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油滑、懒惰的品性。不过他是“吃活饭”的懒人却不是恶人，他对四邻都很热心，是“镇上群众的‘公差人’”，而且也不是无赖（在胡玉音米豆腐摊子上没有吃白食，将地皮卖给了胡）。孤苦伶仃的王秋赦对党和政府的感激和忠诚也是发自内心的，“‘人民政府，衣食父母’。这话王秋赦经常念在嘴里，记在心上。他也晓得感恩……”如果没有极左政治风云，王不过是农村常见的“二流子”，一个芙蓉镇田园生活无伤大雅的点缀而已。但是“本也是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王秋赦不由自主地被推上了光鲜的政治舞台，但他始终不具备杨民高、李国香等人的政治手腕，直到最后他都是愚昧、落后的农民。曾有学者有一段对阿Q命运的分析，我认为同样适用于王秋赦：“阿Q的真正悲剧就在于：既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又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阿Q这样的受苦人确实需要革命来改变命运，但他并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革命，更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结果，在他哄闹的革命中，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断头台”^①。王秋赦其实就是阿Q式的悲剧性人物。

李国香长相丑陋、心理变态，但她的革命动机却不能简单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叙述人对李作为工作组组长第一次入驻吊脚楼的情景有一番描绘：“歪斜的楼屋，荒芜的院子，使李国香组长深有感触，感到自己责任重大

^① 张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4-215页。

啊,解放都十四五年了,王秋赦这样的‘土改根子’还在过着穷苦日子……当李国香在楼下火塘里看到王秋赦的滥碗烂灶缺口碗,都红了眼眶掉了泪!女组长和两个工作人员做好人好事,每人捐了两元人民币,买回一口亮堂堂的精钢锅……工作组还身体力行出义务工……改善了环境卫生。李国香手掌上打起了血泡,手臂上划了些红道道。”尽管叙述人努力保持嘲讽的语气,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李国香对“搞运动,抓阶级斗争”的真诚和躬行。事实上,正是在“解放”、“革命”、“进步”的现代性理想鼓舞下,通过一整套高度符合工具理性的精细革命叙事和斗争技术,蒙昧、专制的前现代病毒与堂皇的现代性伦理达成了共谋,完成了“文革”这场充满理性精神的癫狂表演。

二 秦书田:极左语境中的“佯狂”

如果说王秋赦是“真疯子”,那秦书田就是“假疯子”。“假疯子”是落难的真英雄,是被践踏到污泥中的美玉。“疯癫”是悲剧性的美,是变形、残存的清醒,是时代留给“秦书田阵营”的共同伤痕。比如,“文革”中谷燕山成了芙蓉镇有名的“醉汉”,“醉眼看世情”,“百事不探,借酒消愁,逍遥于运动之外”;黎满庚因为悔恨自己对胡玉音的背叛而承受良心的折磨,“他有时甚至神经质地将双手巴掌凑在鼻下闻闻,仿佛还闻到一丁点儿血腥味似的”;而“这些年来的折磨,也使得胡玉音心虚胆怯,多疑。……她时时胆战心惊,神经质”。

和现实中的路翎一样,秦书田是一个被疯狂的时代逼成癫狂的知识分子。这位“吹、打、弹、唱四条板凳都坐得下,琴、棋、书、画也拿得起”的州立中学前教员,县歌舞团编导,因为编导《喜歌堂》而被打成右派,是落难的英雄。据叙述人交代,“秦疯子”命名来自他被划为右派后的巨大刺激,“从此,秦玉书就圩圩都在圩场上露个面,有人说他打草鞋卖,有人讲他捡地下的烟屁股吃。人人都喊他‘秦疯子’”。然而秦疯子的疯癫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内涵,“对于秦疯子,本镇大队的干部、社员们各有各样的看法”。如果我们拼接起这些“盲人摸象”式的印象,秦疯子的疯癫就清晰起来。他的疯癫中有屈辱和痛苦,“莫看他白天笑呵呵……晚上却躲在草屋里哭,三十几岁加

一顶坏分子帽,哭得好伤心”;有知识分子生活习惯在小镇人眼中的异质性和喜剧性,“有的人把他当本镇的‘学问家’……尊他为‘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晓得全’”;有“竹林七贤”般的“佯狂”,“有的人讲他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穷快活,浪开心,活作孽”;也有对生存意义的拷问,“还有民兵晚上在芙蓉河边站哨,多次见他在崖岸上走过来,走过去,是想投河自尽?又不像是要自尽,大概是在思虑着他的过去和将来的一些事情”。

最为关键的是,“假疯子”的“真”在于:“秦书田阵营”“真诚”信奉政治理性,对红色政权忠贞不贰,他们坚信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且不说根红苗正的“北方大兵”谷燕山和“满庚支书”,即使是“客栈老板的小姐”胡玉音对“五类分子”的评价也是“人渣、垃圾”和“黑心黑肺黑骨头”。作为“五类分子”的秦疯子同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自己搞了一套“施政纲领”,在同类中分出三六九等,将自己与那些以破坏政权名义被改造的“地富反”严格区分开来。在一个谈性色变的年月里,他甚至不惜牺牲名声,主动承认自己曾和女演员搞过两性关系,借此用一顶小一点的“坏分子”的帽子换掉“右派”的高帽。秦癫子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几近滑稽的“积极”是他疯癫的组成部分,叙述人借此反讽了极端政治理性本身的癫狂,但这明显是回溯历史的俯瞰视角,而在极“左”的政治语境中,秦书田的“积极”只能是一种拼命的反省,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荒诞。这使我想起了巴金老人的回忆:“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真心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①

“假疯子”中的“真”是一种“路遥知马力”的忠诚展演,“疯癫”成了英雄体内的弹片,是受难蒙冤的“大多数”再次走近政治理性的诚信资本。阴霾过去,“秦疯子”还原成了县文化馆副馆长,谷燕山当了镇党委书记,黎满庚也官复大队书记。其实,“真假疯子”都被绑在政治理性的跷跷板上,信奉着同样的政治逻辑:“当时,在一些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中间,流传着这样一

^① 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324页。